

MA BO-YING

中國醫學文化史

上卷

马伯英 著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圖書文化史

中國圖書文化史

中國圖書文化史

中國圖書文化史
中國圖書文化史
中國圖書文化史

上

卷

马伯英 著

中國醫學文化史

馬伯英題



MA BO-YING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总序

2006年4月14日，登维苏威火山，访庞贝遗址，忽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首诗：

庞贝废墟千百年，
维苏依然起白烟。
扶杖登陟气犹喘，
拾石揣怀心渐平。
沧桑谁能留故物，
历史最是欺新人。
回眸夕阳浮红霞，
万古终惜一片情。

面对历史，我们都是新人。历史的真相，隐藏在那些千百年的残留物中，我们应当如何去探寻它们？证据常新，方法常新，辨识常新，结论常新，这就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证据，证据史学（Evidence Based History, EBH）是史学界一直贯彻的传统。发现证据，就是找出“有什么”。那里有过什么，历史上存在过什么。文献的考索、考古的发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证据搜集方法。口述历史是较迟出现的方法。但是，过往有一种方法不为历史学家所重视，那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1988年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中国科技和医学史国际学术会上发表论文，提出了这个问题。嗣后我在研究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应用了这一方法。现在，这一方法已为史学界广泛采用。此方法的基本点有二：田野调查和将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其好处是，发现了一些过去不受重视或忽视了了的证据。换言之，文化人类学方法有助于找出那些隐匿在表象后面的真

实，发现新的证据。

找到证据，此证据是真是伪？需要辨识和判断。去伪存真，需要历史学家的智慧，动用史鉴和史识功夫。这也是史家的基本功。除此之外，慧眼识珠，又是另一种高明。比如，一般来说，孤证不受支持。然而，有时未必尽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原到那个时代的情景中去，找出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方式，就能帮助“沙里淘金”，有些孤证也就因之不孤。鉴别成功，就弄清了“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此亦有助益。

经过以上的努力，一个新的结论就翩然而至。然而，史学家还有个责任，是要回答“为什么”。历史事件需要解释，才能阐明真理，找到一些规律以警示世人或吸取教训。这不是很容易办到的。有一次，一位年轻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对中国科技在近代为什么落后于西方的问题作出解读，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只学人家技术，不学理论原理。举的例子是19世纪初牛痘传到中国，学到了方法，却没有学到免疫学原理。我场下悄悄对她说，那时西方免疫学还没有诞生！她的贸然，一方面是对史实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对那时代的科技文化状况没有全面把握。回答“为什么”，还是应该回到时代的情景中去，了解怎样发生、怎样结束，找出各种相关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从事件的全过程着手，才能真正知道因果关系、影响关系或其他关系。在此层面上，文化人类学也是很能帮上忙的。解析史学近些年来日趋走俏，但正如朱维铮教授指出的，连“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怎么能侈谈“为什么”的问题！我则加上一条：连“有什么”都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完全，又怎能谈“是什么”、“为什么”！

如是，则历史研究的三部曲：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都可以应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而且在每一部曲，均可有所斩获。

以上我强调的是文化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并且应当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这是在原有史学研究方法论基础上的加强，但并非取代。有意义的是，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每一次方法论的突破，总是带来科技进步的跃迁。在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也应是如此。这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将文化人类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的原因。

文化人类学涵括的范围很广，有一些是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比如考古学，几乎每一位历史研究者都会利用一切考古新发现作为研究的新证据。但是，历史

学家比较不熟悉的诸如作为文化人类学强项的田野调查方法、原始思维和巫性思维研究、民族学、语言学等等，却正是发现、甄别、解析新证据的重要方法。史学研究者有必要补上文化人类学这一课。现在，西方的医学史专业研究生，如果论文中不包含人类学方法内容，其论文得不到及格分数，可见其受重视程度。史学家有一个比人类学家讨巧的地方，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可以利用和应用人类学家的成果，比对历史上存在的现象，从而认识该种现象的本质。历史学家不需要也不可能事事都去长时间地做田野调查才得出结论。善于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做学问的一个窍门。

* * *

1985-1988年间，我应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博士之邀，在剑桥作为他们的合作者，帮助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的医学部分撰写。有一天，他的秘书、美国学者 Gregory Blue 博士与我聊天，问我：你看李约瑟的研究还有什么缺陷没有？我回答，他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将世界看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眼光扭转过来，发现古代世界重大的发明、发现，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创造的。他做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史。他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涉及，也许是因为年龄和精力的原因，他未能分身顾及。那就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实际功能和社会效益问题。举个例子，我找来一个中国人，比你们美国人个子都高。然后说：中国人个子比美国人高。就这个人来说，这话没错。然而，就整体而言呢？美国人的平均身高显然比中国人高很多。在剑桥的第三年，我自费申请到剑桥大学科学哲学史系做访问学者，那里的学者们的兴趣是探讨“为什么”的问题：有成就，为什么会有成就；有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大家知道，李约瑟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困惑”（Needham's Puzzle）。大家几乎都从社会和文化因素来寻找原因。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想的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与西方科技革命可以在一条线上发生吗？不是一家人，不说一家话。席文教授也许就是从这一角度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问题。那时我与许多科学哲学史系的朋友接触，就便看了些文化人类学的书。我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科学技术有自己的轨迹，要在自己的轨道上才能起飞。中医学是一个典例。

我因此通过对全部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研究，得出了中医学的本质是朴素的生态（包括自然、社会生态和心理环境）医学适应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卫生预防、临床施治和延年益寿的实践中具有切实可用而有效的特质。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结论。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写进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方面是当时想法没有十分成熟；加以鲁桂珍过早逝世，我写的内容无人译成英文。李约瑟因此改变计划，邀请我 1993 年第二次到剑桥，帮助校改他们原先发表过的中医史论著。我为之改正二百余处，但就个人研究成果而论，我无法加进我的思想。那半年里，席文教授没有来剑桥，我们没有沟通的机会。他作为编辑，后来写了很长的前言，表达了他的思想，我那时并不知道。我的学术思想，因此与他就又不是一回事了。后来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九届东亚科技和医学史国际研讨会（1999）上遇到席文教授，他跷起大拇指对我说：“你的《中国医学文化史》很棒！你是 Number One！”他是很少夸人的。他这回是第二次夸我了。第一次是 1986 年，答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家 Catherine Despeux 问“谁在中国医学史研究方面最好”的问题时说：“马伯英。”法兰西学院因此邀我去作了一次讲座。从他对我著作的欣赏看，其实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看重医学史的研究要放在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所有历史成就或历史问题，只有在社会文化的关系中才能解析出真实的面目和答案。

* * *

检阅我自己医学史研究走过的历程，有三个阶段特别重要。1978 年我考上“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进入中医研究院医学史专业学习。这三年最大的好处是拜中研院院长季钟朴和医学史研究室主任李经纬老师之赐，我们能呼吸学术上的自由空气。那时第一年是在北京中医学院修习《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经典，由任应秋、王玉川、刘渡舟、赵绍琴等名师指点。第二三年除了医学史、科技史的一些基础知识外，就全由研究生自己琢磨着做研究。题目自选，材料自找，直到写出论文方交导师审阅。我那时的兴趣在中医理论的研究，想弄明白中医不同于西医，却为什么如此有效。这种有效的经验是我在“文革”十年期间自学中医并在临床疗效中体会到的。那时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我的医名的。我是靠中西两法治愈病人而得名的。作为一个本身是西医师的人，如果不是切身体

会，不会相信中医；如果不是效验亲自所得，不会有追求其理论渊藪的动力。一入中医最高殿堂，我如饥似渴，补充中医理论和历史知识。从哲学的角度，我发现中医理论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和朴素系统论的方法论基础之上。从中西医比较的角度，我发现中西医是在同一条历史长河中流淌，总体上可区分为五大阶段。有分有合，目标一致，但各擅胜场。合是因为方法论同一，分也是因为方法论差别。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我发现医学史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发掘，而不是如有人所论：前辈们已经做到极致，我们已不能前进一步了。从入学第一年开始，我的论文在国内外许多权威刊物上发表，引起侧目。有人到院领导那里告状，说我擅自在外国刊物发表文章，违反纪律。幸而季院长说：“研究生能在外国刊物发表文章是好事。”

我关于孙思邈年龄的考证结论与李经纬老师过去研究结论相悖，李老师却特荐在《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鼓励不同意见争鸣，即便是我这样刚入门的新手。我的毕业论文“试论祖国医学基础奠定时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被一字未改交上答辩并获通过。这就是当时的学术自由空气，让我得益匪浅。

1981年研究生毕业，本来早被内定留院工作的我，却因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要求和我家庭在沪的原因，最后到上医工作。我的创业时期开始。教务处长王朱教授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我创办了新的医学史教研室，主编了上中下三册的《中外医学史讲义》数十万字（这是得到席文第一次称赞的缘由），翻译出版了《世界医学五千年史》，继续发表了许多论文。与此同时，积极准备到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医学卷的合作事宜。这件事是因为在北京时庞朴、谢韬、何祚榕三位老前辈、老伯乐的推荐而成就的。他们受李约瑟委托与我面谈，大概看中我中西医兼通，历史和哲学并修；然后李约瑟和鲁桂珍审阅了我的简历和论文后要了我的。我到剑桥，称李约瑟为“老师”，李约瑟却说：“我不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合作者。”使我受宠若惊。在他1992年第二次邀请我到剑桥合作的信中，他说：“你是在医学卷中最能帮助我的人，而我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确实，我是唯一一个从中国邀请出来较长时间在剑桥工作的人。他们对我的工作完全放手，要我按自己想法尽力去做就行。这又是学术上的宽松环境。我阅读了大量在中国难以一见的中外书籍，写出我的见解。因为我没有英文基础，李、鲁只要求我用中文写，留待桂

珍去翻译编辑成书。后来桂珍去世，此事无能为继。1993年我二到剑桥半年，任务就是将他们发表过的旧作修正后合辑成书。两次到剑桥，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特别是1988年在剑桥大学科学哲学史系，与一些学者朋友交往，受启发颇大。这期间没有其他任务，自己寻思着找看了文化人类学等过去从未涉猎的领域的著作，开始思考能不能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应用到医学史研究中来。

1988年底回国，满腔报国之情却被压抑下来。“鹊巢鸠占”，除了完成教课任务，我是入了冷宫。但这些身外俗事，并不能挫折我的意志。倒是多了点时间留给自己去做学问。论文一篇一篇接着发表。1990年8月，素未谋面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志国先生突然驾临寒舍，要我写一部《中国医学文化史》，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不要我自垫资金；不要我自销部分书籍；字数不限。他真是一位有眼光、有眼力、有担当的编辑。我欣然同意。我把三余时间全投入到写书之中。1991年7月，我交了稿，七十余万字。这时候编辑工作已由罗湘女士接班。期间又有文汇出版社的吕明方先生前来约稿，要我写一部《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条件一样。此书在1992年6月交稿，五十四万字。我加了个副标题“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突出文化人类学的况味。结果，文汇的书出得快，1993年10月面世；《中国医学文化史》则在1994年5月印出，不久售罄，乃有一次重印。据说此书还得了奖。至2007年，罗湘女士找到我，说上海人民出版社希望将两书合在一起，出二卷本，以《中国医学文化史》为统一书名出版。这就是现在这部书。可视为我医学史研究的一次总结。

1995年我第三次到英国，实际上是我医学史研究的第三阶段。部分成果已写入此书，但过程远未完成。这是我医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实践。人类学早期是以“高等民族”对“落后民族”进行研究为标榜的。那好，就中医学这个命题而言，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为高的医学，就是以“高”对“低”了。我要深入到英国民众生活之中，去考察他们何以会对中医感兴趣，逐步接受、理解、融合它。自2000年开始，英国要为中医立法。九年来，风风雨雨，我都参与其中，花费了我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酸甜苦辣，种种滋味尝尽。体会相当深刻。这时我已经不再单单用笔去写历史了，而是亲身参与创造历史。从在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时以“我创造，所以我活着”为座右铭起，我没有忘记过自己要努力创造的使命。我在英国的中医临床过程中不断创新，同时也要为世界医学历史的创新作

贡献。而这又成了我医学史研究历程的一部分。

* * *

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研究，要从四个层面上看：与中国相关、与医学相关、与文化相关及与历史演进相关。第一与第四个层面是地理空间和时间长度的范围问题，不难界定。不同的著作可以截取相对限定的地域和时段加以重点论述。本书第一卷以中国本土为主，从原始人类生存时代直至1949年前后；第二卷涉及近邻和远交的许多国家，从影迹可寻的史前时代直至当今。但篇幅有限，未及全部。余下的时间和空间，留待后继者补缺。

医学的定义较难。广义地说，凡与医事有关的，都可收入本书范围。原始的，巫术的，迷信的，经验的，实验的，民间的，官方的……无不包罗在内。狭义的范围，就是指科学的医学。这含义是指可实证的（可检验的）又可证伪的（可否证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我又主张将“前科学”意义上的医学阑入其中。这是指大量经验证明了但还未被严格科学检验过的医学，或严格科学尚未具备必要手段进行验证的医学。它们排斥巫术和迷信，以临床有效的事实为坚实基础。我相信科学是一个发展过程，科学医学不是一下子突然蹦出来的。前科学的医学就是从一般的经验医学的无数事实凝聚起来到蜕变（脱颖而出）为科学医学的那个临界阶段。尽管人类学家认为巫术与科学是一物而两途，甚至说“巫术曾为科学铺平了道路”，但巫术不能真正发展为科学。这就像人类学家指出类人猿是人类祖先，但类人猿绝无可能变成人类一样。分道扬镳之后，是再也走不到一起去的。巫术可以转化为宗教、迷信、制度等不同文化现象，但转化不成科学。

科学当然也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但科学文化是区别于一般文化的。可以说，科学是文化的结晶。文化是科学的母体。科学医学也是一般医学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这一点上，狭义的医学与广义的医学文化就有了区别。这种区别不是一下子就看得出来的。在医学的前科学阶段，它被一般文化包裹得很紧、很深。它的演进是逐渐发生的。在经验中产生理论，理论又要不断完善。理论最后还需要跃迁，还需要检验。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过程就是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包括外国异文化，影响着中国医学文化的形态变化。有促进的，有促退的。中国与外国医学文化的交流，是跨文化传通的组成部分。所以，本书

之名为《中国医学文化史》，就是讨论中国医学的科学性在一般文化中结晶出来的历史过程及中外医学的跨文化传通过程的。原始医学进步到巫术医学；巫术医学脱胎成经验医学；经验医学一部分转化成实验医学，一部分仍处于前科学医学状态，但那是有希望成为未来医学代表的生态医学。外国医学文化冲击了中国的医学文化，中国的医学文化同样冲击了外国的医学文化，跨文化传通是另一种医学状态。而在一切中国的或外国的社会文化形态中，所有消失了的阶段，都仍然留下它们的孑遗。即使现代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迷信的、宗教的甚至巫术的医学，都仍然颇有市场。这就是历史和现实同在。所以医学文化史不同于医学文化。前者是凤凰涅槃，科学结晶从文化火焰中飞腾而出；后者是火焰本身的原貌和燃烧后剩下的废墟。我希望，本书说清楚了这一点，笔者的目的就算基本上达到了。

在旧作《中国医学文化史》和《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合并成今本《中国医学文化史》二卷本付梓之时，谨书此以为总序。

2010年1月5日 马伯英于英国伦敦

上卷英文目录及摘要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VOLUME I)

CONTENTS

PREFACE

INTRODUCTION

Part On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Medicine

- 1st Chapter. Primitive Human Beings and Their Culture, Health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in China
- 2nd Chapter. Primitive Mode of Thinking and Primitive Forms of Worship
- 3rd Chapter. Primitive Views of Life, Death and Illness
- 4th Chapter. Witchcraft and its Treatments
- 5th Chapter. Origins of Chinese Medicine
- Brief Conclusion

Part Two. Chinese Medici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Politics

- 6th Chapter. Tao, Qi, Yinyang and Wuxing were interfused into Medicine
- 7th Chapter. Medical Secret Groups and the Culture of Occultists
- 8th Chapter. Medicine in the Tao Religion
- 9th Chapter. Metaphysics and Medicine in Wei-Jin Dynasties
- 10th Chapter. Confucianism and Medicine
- 11th Chapter. The Influence of Emperors and Government in Medicine
- Brief Conclusion

Part Three. Medicine in Social Life; Epidemics and the Invention of Variolation

- 12th Chapter. Medicine in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s
- 13th Chapter. Epidemics and Adv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14th Chapter. Smallpox and Variolation in China

15th Chapter. Influ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Medicine; Occupational Diseases

16th Chapter. Genital Culture and Medicine

17th Chapter. Sexual Culture and Medicine

18th Chapter. Diet and the Arts in Medicine

19th Chapter. A Glance at Magical Medicine

20th Chapter. Mentality and Behavior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the Tradition

Brief Conclusion

Part Four. The Cultural Proces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History and its Crystallisation

21st Chapter. The Essential Stream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Main Outcomes

22nd Chapter. The Root of Lif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Brief Conclusion

ABSTRACTS OF 4 PARTS IN Vol. I of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PART I: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rt focuses on discussion of the medical activities in Chinese primitive socie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witchcraft stage of medicine. A primitive mode of thought and witchcraft mainly guided such activities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1.7 million years. However, medical experience had also been increasing and finally the spiritual shackles of witchcraft were smashed by the reasoning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Real medical doctors appeared and the first one was Dr Bian Que (about 5th century BC).

PART II: MEDICINE GRADUALLY INFLUENCED BY NATIVE CHINESE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POLITICAL MATTER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laid in *Huangdi Nei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Medical Canon*), which was written during 239 – 179 BC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cords of secret groups of medicine.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Dr Zhang Zhongjing (ca 160 – 218) and Dr Hua Tuo (ca 145 – 207) pragmatized the principles of prescribing medical herbs in *Huangdi Neijing* and *Shennong Bencaojing* into the form of formulas for clinical practice, therefore the clinical system of Bianzheng Lunzhi (patter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hanghanzabinglun* became the canon of clinical medicine. Taoism, Confucianism, philosophical sects in the Wei (220 – 265) and Jin (265 – 460) dynasties and Buddhism also gave great influence to medicine. The

government, even emperors, also influenced medicine very much. The doctors in the Tang dynasty epitomized the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to a few medical encyclopedias and Chinese medicine became a mature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A tradition of combining Confucian and Taoist medicine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lways followed this pattern during later dynasti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is a kind of plain ecological theory including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PART III: MEDICINE IN DIFFERENT NATURAL OR SO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ERAL FOLK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various changes of natural and social ecological conditions. Peace, war and epidemic pestilences influenced different aspects of medicine, mostly with a positive outcome. More and mor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and new theories developed as well. Chinese medicine demonstrated its own great vitality,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Chinese health care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The variolation against smallpox is a very successful example which is recognized as the origin of immunology. Not only the above but als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et, martial arts, sex and perinatal care for wellbeing promoted Chinese medicine. However, even though the main trend of Chinese medicine went ahead in the scientific direction, the superstition and witchcraft still had their own market. Common people seeking treatment were often blind.

PART IV: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was very complex but Chinese medicine is like a large river always with a racing current and developing quite strongly. Dur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re were some periods of a peaceful situation and some of predicament.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medicine and practice in health car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unremitting work of doctors during the past 2 500 years. So many excellent doctors left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for later generation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proven in modern laboratories while many others are awaiting modern scholars to probe their profound mysteries. Chinese medicine will continue to be developed by its own way and contribute to human health.

自序

写一部《中国医学文化史》，是过去还从未有人做过的工作。我的理解，是要把中国的医学从其起源以来，文而化之并最后达到今天这样辉煌程度的过程描叙出来。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医学本身又复杂深邃，要把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医学之间的全部联系一一剖析揭示出来，委实不易。历史上有过原始思维、巫术、宗教、玄学、政治、经济……各种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它们一起挤压、包围着人类，同样也挤压、包裹着中国的医学。即使今天，也依然有历史的孑遗，有迷信，有中国人特有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等等包裹着，有时难分难舍。但中医毕竟是强健地站立着的。中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化腐朽为神奇。个中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她内涵中蕴藏的科学性。

不过，应当指出，当我们说中医学是一门科学的时候，并不等于说她从起源之日起就是科学的；也不是说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科学的。把她描绘得尽善尽美、毫无缺陷，这与将她说得一无是处没有多大差别，同样是在扼杀她的性命。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原理告诉我们的。历史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又是冲刷一切的。它具有的张力，就在于它的容纳和删汰。它在漫长的过程中，使中医学理论自组织起来，有序化、系统化了。历史又允许新的因素、新的发现、新的冲击来锤炼她。即使是迷信、落后、荒诞，也没有什么可怕。来者不拒，生者自生，灭者自灭，而科学的光辉永存。这才叫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时间的磨练。

中医学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健康、茁壮成长，是因为她依凭的中华文化主干是健康、强大的。土壤肥沃，雨量丰沛，环境合宜。中医学的理论构架、哲学模式、实践成就都显示了这种力量。这是中医学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沉沦、在今天的西方式现代化浪潮中也不见得会沉没的根本原因，即中医学生命力之所在。在这个含义上，是说没有中华文化作坚强后盾，中医学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发展。

然而，中医文化中的科学性内涵，需要进一步的锤炼。科学没有国别，科学不属于特定的民族，不限止在某一文化圈内。过分强调中医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依赖